

知 还 集

刘习良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知 还 集

刘习良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还集 / 刘习良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78-3611-0

I. ①知… II. ①刘… III. ①广播电视—中国—文集
IV. ①G2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6132号

知 还 集

著 者	刘习良
责任编辑	祝 晔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3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5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11-0 / G · 1407
定 价	65.00 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翻阅、整理近十几年来撰写的文稿，一句俗话突然冒了出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我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协会）工作已有15载了。15年间，主要做了一件事：调查、思考、研究广播电视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成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编了四部学术著作：《改革开放中的广播电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徐光春任主编，笔者任常务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十年回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在编写这四部史学著作的过程中，除了动手撰写少部分内容外，大部分精力放在审读各位合作者提供的文稿。目前，正在参与杨波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的编写工作，负责1949年~1963年初稿的编写。

此外，还带领一个课题组（成员有曾静平、单亦励、张务纯），于2008年9月完成了《新媒体的出现与广播电视环境态势分析》。

另一部分就是整理历年来撰写的文章、讲话、讲课提纲等。已经成书出版的有《冷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还有手头上这本准备付梓的《知还集》。

《知还集》收集了60篇文稿。除了删节部分内容外，仅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尽量保留原文的本来面貌，其中可见时代留下的印记（例如，新世纪开端究竟是2000年，还是2001年）。一段时间内，曾对同一问题做过多次阐述，内容、用语难免重复。为了保持叙述的逻辑完整，未做删除。不当之处，还望读者见谅。

最后，说一说为什么起了这么个书名。“知还”二字源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引得我想起这两句词语？

那是1990年。当年9月21日，按照部领导的安排，我离开了相依相伴30年的国际台，到部总编室工作，担任总编室主任。1991年5月27日，国务院李鹏总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我为广播电影电视

部副部长。两次提升，均出乎意料，思想缺乏准备。从内心讲，一方面十分感谢中央领导和部领导对我的培养和重用，深感此事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对有些事情还是恋恋不舍。依恋什么？就是翻译！

如果从 1955 年首次担任口译译员算起到那时，我从事翻译工作已有 35 年的历史。口译、笔译、中译西、西译中——凡属翻译的各种传递方式都曾干过。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正热衷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丁美洲、西班牙作家的小说，而且已经翻译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当时，我心里很明白，部领导的工作十分繁忙，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方能保证不出大的失误。这就意味着要立马中断心爱的翻译。于是，我请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用隶书写下“知还室”三个大字，并把横幅张挂在书房门上端，以便时时提醒自己。一位老同志曾经问我：“刚当上副部长，就想着‘知还’。你想回到哪里去？”我回答说：“终有一天回归翻译队伍。”这是我的心里话。那时候，只有一个浅显的想法：副部长是职业，早晚要被免职；翻译是事业，可以终其一生地干下去。

后来，又有了另外的想法：本来我就是一名平头百姓，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过十余年，最终还是要回归平民队伍。

如今，第一个回归已经完成：我和笄季英费心费力合译的《幽灵之家》已经再版；《玉米人》、《恶时辰》、《枯枝败叶》、《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即将再次问世。余愿足矣！

最近，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将要召开第六届理事会会议。本人也将退出最后一个公职——中广协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此后，将和左邻右舍、新朋老友一起读书看报，公园散步，上街买菜，打扫庭院，安度晚年。

是为序。

2012 年 11 月 11 日
于知还室

目 录

自 序	1
-----	---

怀念篇

崇高的人品，渊博的学问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3
怀念冷西同志	8
怀念梅益同志	13
怀念知生同志	18
一身正气，永驻人间 ——怀念丁一岚同志	22
一部常读常新的书 ——《丁一岚传》代序	28

宏观篇

90 年代国际电视业的发展趋势	35
新世纪国际电视发展趋势	40
【附】卫星电视发展历程相关资料	41
WTO 和我国的广播影视	47
“入世”后，我国广播电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54
面向 21 世纪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的初步思考	73
我国电视业改革的进程及前景展望	83
提高改革的自觉性，增强发展的科学性 ——试论改革开放 30 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	106

寻路和趁势	117
实事求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124
关于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几个问题	130
多查·多问·多思	137
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我们的基本责任	141
突出中心，狠抓重点，积极拓展	147
以史为鉴和实事求是	154

中观篇

可持续发展——广播业的最佳选择	161
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广播改革	165
站在北京看全国	
——试论汪良广播经营理念的普遍意义	171
广播交通宣传的启示	179
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情况	183
立足乡土，解疑释惑	200
反思对外传播	204
电视外宣：大有可为的事业	210
研究世情，把握国情，不断推进电视对外传播事业	215
电视对外传播要增强四种意识	221
敢问路在何方	
——电视节目市场纵横谈	226
广电产业发展路径：任重道远	230
关于推进数字电视发展问题	238
三网融合散论	248
在竞争中求发展	254

微观篇

新闻节目的改革与创新	263
电视新闻节目创新的五个要点	269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散论	274
在探索中前进，以创新求发展	279

“电视纪录片”辨析	284
在喧嚣中保持沉静心态	287
和时代同步行进	292
电视文娱节目散论	301
方向正确，质量第一	306
我们的责任	311
回乡忆旧话戏曲	316
试论电视戏曲的六个问题	320
悉心呵护这株素雅的兰花	327
找准位置，找出原因，找对方向	331
【附】再谈找对方向	337
关于播音和主持节目工作的一个认识问题	341
播音主持工作发展趋势预测	346
四十五载挺立潮头	354
不拘一格，因地制宜	358
回顾与瞻望	364
广播电视报的出路：服务、市场、联合	371
电视价值全面评估的新探索	374
依靠两根支柱，开辟一条新路	377
五年辛苦不寻常	380
后 记	389

怀念篇

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在转折期都需要引路人。他们就是我在青年步入社会、中年业务转型时期的引路人。当年，我是他们的学生；如今，他们依旧是我的老师。

崇高的人品，渊博的学问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200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周总理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在他晚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抱病之身，依然一如既往地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所有真诚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如今，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先人遗志，正在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奔向全面建设中的小康社会。抚今追昔，不胜感慨系之！

17岁那年，我服从国家分配，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来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通常只说“北外”）学习西班牙语。1957年秋季毕业后，我又进入高级翻译班深造。在上学期以及参加工作之后，我曾经有幸多次为周总理担任口译译员。周总理的崇高人品和渊博学问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纪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伟人诞辰的时候，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总理身边。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各个涉外单位请来了许多外国客人。一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见参加国庆观礼的拉丁美洲朋友。中拉友协领导派西班牙语老翻译蔡同廓同志和我给两位领导做口译译员。外宾尚未到场，周总理就提前来到会见大厅。他问我们：“今天你们两人当翻译？”老蔡回答说：“我给主席当翻译，他（指我）给您当翻译。”总理笑着说：“好，好。”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那是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心里未免十分紧张。

那次会见是“游动式”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坐下来，而是随便地边走边和外宾交谈。有时候站下来，外宾聚拢在他们周围，谈得很亲切。总理站在人群中侃侃而谈，向大家介绍1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引用了大量数字。对初做口译工作的人来说，翻译大数字是个难题，因为西班牙语中数字单位的划分和汉语不完全一样。西班牙语中的“百”、“千”、“百万”和汉语一样，但是，“万”、“千万”、“亿”就用“十千”、“十百万”、“百百

万”来表达。临时换算很容易出错。平时做口译，遇到“十亿”，就在小本子上画出9个圈儿，再把每3个圈儿后面画上逗号，才能找准译法。那天，总理使用的大数字特别多，而且走动或站立时都不像坐在椅子上画圈儿那么容易。因此，总理一开始谈数字，我就很紧张，生怕译错。可能是总理看出我是“初出茅庐”，神态紧张，于是每说到一个大的数字，马上就换算为西语惯用的单位，比如说了“50亿”，立刻补充说“就是5千百万”。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一则心里十分感激周总理对年轻的翻译如此悉心照顾，二则非常佩服总理换算数字之快捷。

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北外”领导通知我说，总理要接见两位智利外宾，接待单位请学校派一名译员，校方领导决定派我去。能够再次给总理当翻译，心里自然很兴奋。起初，我以为总理日理万机，和一对名气不是很大的智利夫妇见面，估计只是短时间的礼节性会见。谁知谈话竟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而且话题十分广泛。刚一坐下来，总理就说：“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我知道是想借我之口向贵国人民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我很感谢你们的好意。”几句话，就把谈话双方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接着，总理旁征博引，谈古论今，回答了外宾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其中特别谈到中国和拉美国家具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总理从发现新大陆说起，谈到19世纪外国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入侵。可能是不小心，把“殖民主义”翻译成“帝国主义”了。总理两次提醒说：“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说的是‘殖民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这才马上警觉起来，原来总理不是只顾自己谈话，同时还注意翻译得是否准确。

1960年9月28日，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西半球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国建交后不久，11月17日到12月1日，古巴银行行长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我国。1961年9月底到10月初，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来华访问。为了接待好这两个重要的古巴代表团，外交部从各单位调集了好多名翻译，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因工作需要，我已经在翻译班提前结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工作。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两个代表团，并且主持了实质性谈判。

1960年11月18日下午，总理在中南海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总理和格瓦拉分宾主落座，我坐在两位闻名遐迩的领导人后面中间的椅子上，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总理首先询问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方面的情况，谈话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总理随后告诉格瓦拉，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承诺从1961年到1965年给予古巴一笔折合6000万

美元的无息贷款。对方对此表现得十分兴奋。

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帝国主义进行尖锐的斗争；另一方面，和苏联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和古巴这类国家实际存在的矛盾，维护国家利益，的确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古巴盛产蔗糖，希望中国每年购买他们生产的100万吨食糖，而且盼着卖个高价。那时候，国际糖价是每公斤7美分，苏联从古巴购买原糖只给4美分。古巴人一直不肯透露实情，只是询问我国政府出多少钱。总理很清楚苏古之间达成的协议，就用了一个很聪明的说法：“苏联是老大哥，他出多少钱，我们就出多少钱，我们不能越过老大哥去。”一句话说得对方无话可说。

谈话当中，格瓦拉少校告诉总理：“古巴大使正在来华途中。”我顺口翻译成：“古巴外长正在来华途中。”总理面现诧异，马上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我立刻意识到翻译错了，赶紧更正过来。总理没有发火，笑了笑，说：“你也算老翻译了，怎么连‘大使’和‘外长’也搞混了！”本来准备挨几句严厉的责怪，听到的却是充满和蔼口气的善意批评，心中非常感动。当时，只觉得愧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可并不感到紧张。

在其他几次给总理当翻译的过程中（最后一次是1962年），对总理的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言谈生动、待人谦和以及他充沛的精力、过人的记忆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时隔多年，每每忆及，还是宛如昨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已经退出了口译工作，专门从事汉译西的笔译。除了翻译对外广播稿件外，还参加了一些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声明等的翻译工作。

最难忘的是党的“九大”期间，周总理五次接见“九大”文件翻译班子，回答翻译中遇到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开幕，24日闭幕。整个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4月4日下午，来自10个单位的74名翻译（包括我们西班牙语组15名翻译）集中到新华社，组成“九大”文件翻译班子。工作期间，大家吃住在新华社，一步不能离开，直到大会结束。

当时，“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九大”文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翻译人员丝毫不敢马虎。凡是弄不懂中文含义的地方，我们都提出来，请有关方面解答。

翻译的第一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4月8日晚上，周总理以及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翻译开会，解答翻译“党章”中提出的问题。周总理来到会场后，和所有参加翻译工作的人一一握手。在和我握

手的时候，说：“噢，你也来了。”那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人人都觉得抬不起头来。没想到时隔数年，总理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个头顶“白专”帽子的小翻译。看着总理清瘦的面庞，我不禁热泪盈眶，心情许久难以平静。

4月26日上午，我们得到通知：当天要拿出报告的全文。中午1点半，总理和其他人在钓鱼台第四次接见翻译班子以及电台和《人民日报》的代表，询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5月1日晚6点45分到7点，总理和其他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九大”翻译班子的中外人士，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接着，安排我们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烟火。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理在百忙中接连五次接见翻译人员，真是空前绝后。尤其是他对翻译的照顾、回答问题的简明准确、举重若轻地扭转尴尬局面，确实让人钦佩。

1971年，组织上派我到河南淮阳干校劳动。转过年的3月底，校方通知我回北京，参加广播事业局接待随同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访华的电视报道组工作。4月19日，埃切维里亚总统率领的墨西哥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到首都机场迎接。4月24日，墨西哥总统离开上海。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能远远地望着日渐消瘦的周总理，没有机会给他当翻译了。

谁曾想到，见到总理最后一面，竟然是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

1976年1月，我正在《毛泽东选集》翻译组工作。8日下午，组里传开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身患癌症于当日与世长辞。听到这条不幸的消息，一时惊呆了，简直难以相信真有其事。和全国人民一样，全组同志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9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关于周恩来同志逝世的讣告，证实了人人不愿意相信的噩耗。全组同志潸然泪下，根本无心继续工作。

10日，天气严寒。上午，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我正闹严重的胃溃疡。一着寒风，肚子疼痛难忍。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亲眼看看总理的遗容。1点30分，我们和其他人排成两行长长的队伍，鱼贯进入太平间。太平间门口悬挂着黑黄两色的绸带。在那间不大的房子里，躺着一代伟人。只见他两颊下陷，脑门显得特别宽大，仿佛装满了人类的智慧。眼望着总理遗容，顿时觉得一股强烈的悲痛从心底往上涌，泪水模糊了双眼，心里不断念叨：正是全国人民需要您支撑时局的时候，您怎么就走了呢？回到办公室，一连数日，难忍悲痛。13日晚，我去到天安门广场，只见人山人海，哭声感天动地。白色花圈布满烈士纪念碑下面，白色小花缀满柏树枝头。时至深夜，群众自发组织的队伍仍然

不断涌向天安门广场。巨星陨落，唤起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历史毕竟要由人民书写！

回忆往事，总理的高贵品德、坚强意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已经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成为鼓舞我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2008年3月5日)

怀念冷西同志

6月16日晚，我正在家中收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突然接到总局值班室小何打来的电话，说当天下午4点多钟，冷西同志不幸逝世。听到噩耗，我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下，几乎惊呆了。今年春节前夕，我和郭宝新同志到北京医院探望冷西同志。看上去，人虽然有些消瘦，谈起话来，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还是那么条理清晰。他谈到当前广播影视改革，谈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工作，谈到要组织记者去西部采访，显示出对广播影视事业的一片真情。不想那次畅谈一别，竟成永诀！我们失去了一位劳苦功高的新闻界老前辈！我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

18日上午，我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几位工作人员前往冷西同志家中吊唁我们的名誉会长。走进灵堂，眼望着面带微笑的冷西同志的遗像，不禁潸然泪下。悼念后，我们一起看望萧岩大姐。大姐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帮助写好冷西同志的生平。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思念老部长之情油然而生，一件件难以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958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当时，学院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为学员作形势报告。有一天，学院通知：吴冷西同志应邀来校介绍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听讲的人数很多，不能全到大会会场，我们只能通过有线广播在教室里收听。冷西同志讲了整整半天，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把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第一次听冷西同志讲话，他那丰富的知识、精到的分析、卓越的口才给我这样的年轻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听人说，冷西同志讲话的时候，根本没有讲稿，单凭几张纸条（或是卡片）就讲了半天。这件事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59年9月，我被借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帮忙接待一批拉丁美洲的新闻记者。我的工作是做口译译员。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最怕的是主人讲话啰唆、重复、逻辑混乱。碰到这种情况，译员就得善于抓住讲话的主旨，重新组织讲话的段落，方能让对方听懂。当时，冷西同志是记协主席。9月26日，他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的时候，全面介绍了我国的形势以及新闻界的情况。他讲话的特点是逻辑清晰，段落分明，重点突出，用词准确，翻译起来十分便当。用“出口成章”来形容他的讲话，那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这两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然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而且一直把冷西同志视为学习的榜样。

和冷西同志直接接触，开始于1982年。当年5月，冷西同志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当时，和全国一样，广电系统的干部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候。他到任不久，就动手解决中央三台的干部老化问题。那时候，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拉丁美洲广播部任副主任。5月17日下午4点半，冷西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1）你对国际台改进工作有什么想法？（2）你对如何使用外语干部有什么意见？（3）你对国际台的班子有什么想法？（4）你的第二外语学得怎么样？此次谈话前，在国际台已经流传可能要任命我做副台长的消息。有了前面的铺垫，我当然很清楚冷西同志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简单回答了他的提问后，冷西同志说：现在正在研究国际台班子的组建问题。他希望我发挥懂外语的优势，为全台提高外语水平多做一些考虑；还说，我的汉语也有一定基础，可以在编辑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还认为，我的思路比较开阔，比较活跃，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最后，希望我好好努力，争取成为宣传方面的人才。

这次谈话委实令我十分感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只有13岁。上中学，上大学直到参加工作，可以说我完全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长大的。高中毕业前，我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20多年来，我不但难酬夙愿，而且一直顶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的帽子。我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不敢说没有丝毫私心，主导想法还是要用真本事为祖国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这份苦衷一旦得到理解，激动之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冷西同志的谈话既是贯彻党中央的干部路线，也是他个人爱护干部、培养干部的实际行动。

1982年6月10日下午，部领导召开全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冷西同志在会上宣布经过中宣部批准的中央三台负责干部名单。当时，我还是预备党员。他在念到我的“政治面貌”时，特别加重了语气。是表示“遗憾”？是强调“破格”？还是有其他用意？我就说不清了。不过，他当时的语气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党中央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纲领。会后，冷西同志结合广播电视业的实际情况，坚决贯彻大会制定的重大方针。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制定《关于广播电视工作汇报提纲》是他在广播电视部工作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为发展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